

# 从刘勰到韩愈：道的逻辑生成与文论体现

邓郁兰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文与道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概念范畴，在探讨二者关系的过程中产生了“文以明道”、“道胜文至”等一系列经典表述。本文试从首次提出明道传统的刘勰出发，与唐宋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进行对比，厘清两种“道”的思想文化根源和具体文论体现上的异同，藉此形成文、道及其关系的深层认知。

**关键词：**刘勰；韩愈；道；文

## From Liu Xie to Han Yu: the Logical Generation of Dao and the Embodiment of Literary Theory

Yulan Deng

College of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Abstract:** Literature and Dao are important conceptual categori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process of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 series of classical expressions such as “literature clarifies Dao” and “Dao wins literature”. Starting from Liu Xie, who first proposed the tradition of Ming Dao, this paper tries to compare with Han Yu, the leader of the ancient prose movement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clarify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roots of the two “Dao”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embodiment of specific literary theories, so as to form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Dao and their relations.

**Keywords:** Liu Xie; Han Yu; Dao; Literature

谈及古今文、道关系时，难以绕开韩愈在古文运动中始终践行着的“文以明道”一说。但若追溯该说法的本源，将落回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垂道”。事实上，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多次提及“道”的概念，并以其为思想基础，建构出一套系统全面的文学理论。虽韩愈在其诗文中并未对这部作品进行阐发与评价，无明确的表述证明二者的关联，但若将二者横向比较，可以窥见其中的同中存异。本文试对其进行探究，就此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 一、道的儒学渊源

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刘勰这样写道：“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sup>[1][45]</sup>他将孔子置于至高无

上的“圣人”之位，为见到孔子而欣喜，甚至直呼古往今来，再也没有人能像先生您一样著书立说、开一家之言，极言自己对孔子的仰慕之情。他之所以创作《文心雕龙》，也是因为想要“敷赞圣旨”，但在经书的注疏方面早已有大儒在前，对义理的解读精深到了后人难以超越的高度。所以刘勰试图另辟蹊径，从为文的角度来诠释“为文之用心”，“述先哲之诰”，完成前人未能完成的工作，作出一部体大思精、深得文理的系统文论著作。

《原道》篇为“文之枢纽”之首，可视为全书的思想与逻辑起点。刘勰在此篇中“爰自风姓，暨于孔氏，元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sup>[1][13]</sup>，更是直接将“道”与孔子相结合，将“道”的传承与“圣”相联系。所以刘勰作《征圣》与《宗经》篇紧随其后，将三篇相融合，指出：古代圣贤是“道”之传承者，他们拥有美好的性情风采和高尚的道德言行，而这些都蕴藏在他所作的文章之中，言辞简洁但寓意丰富、意蕴深远。从而有机统一了道、圣、经，形成三位

**作者简介：**邓郁兰（2001-08），女，汉族，湖南省邵阳市人，湖南师范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一体的理论体系，将抽象而难以言说的“道”被转化成了具体可学的儒家经典，“本乎道”具体为“本乎经”，刘勰在此基础上构建《文心雕龙》的文论体系，处处强调、推崇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观。

刘勰也从儒家中吸收、借鉴了天、地、人的“三才”观念：“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sup>[19-10]</sup>这与《周易》中的天道、地道、人道的内涵是相似的：“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sup>[2]</sup>在两种表述中，人都立于天地之间，为天地的阴阳柔刚所禀沐，从而自身得以感化，或产生了天地之心，感通万物之灵，或因此具有了仁义的属性。

种种可知，刘勰虽并未对“道”的内涵进行明确的定义，但这一概念显然与儒家有着紧密的文化关联。而韩愈作为传统儒士中的一员，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有意识地继承和发展儒家道统，其所作《原道》篇更是为唐宋古文运动展开及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

而韩愈从推崇的“道”并非汉代以来的古今经学，而是直指先秦儒家的孔孟之道。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力排百家，成为官方所认定的正统之学时，儒家逐渐与当时的政治伦理相结合，利用自身的社会道德教化功能，转化成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保持现有制度的思想工具。由儒家到经学，这一转变的正式形成，标志着它已具备了三个最鲜明的特征：与皇权政治结合，由民间学术发展为国家意识形态；从诸子百家之学变成儒家专修的一家独断之学；经义解释、治学方法的固定化及其严格的非批判性<sup>[3]</sup>。这种固定的章句之学意味着儒学之路走向封闭和僵化，只能接受和遵从，儒者不再有自我阐释的空间，不再有任何发展的可能性。独尊与独断的权威正在夺去儒学的生命。

韩愈不直接批判让儒学逐渐失去生机的汉儒，而是在《原道》篇中重新建立一套儒家的道统体系：“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sup>[4][18]</sup>通过在儒道内部进行一定的厘清，重新梳理由尧、舜至孔、孟的儒家“道统”本体，抚开蒙在孔孟儒道上的阴翳，韩愈试图从根本上来明确儒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使天下之人重回正统儒学，领悟先秦儒学的真谛。

韩愈与刘勰的“道”观中都以儒家道统为思想根柢，

但在儒学具体的内容分支上有所差异。刘勰继承孔孟、周易等多种儒家文化观念，而韩愈有意识地采纳先秦孔孟的儒学根本，复古道以扬新。

## 二、博采众道与独尊孔儒

刘勰的“道”以先秦以来的儒家思想为主，但也深受佛老思想的影响。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佛教文化传入我国，随着其与中国传统的文化、风俗的结合逐渐深入，佛教在民间广为流传，获得了大批百姓的信奉。以致于魏晋南北朝，封建帝王也成为佛教的信徒，佛教在庙堂之上发展兴盛。刘勰出身卑微，年少时就进入寺庙，在寺中整理佛经，参与佛教活动，有较高的佛学修养。他曾拟《灭惑论》，以缜密的行文逻辑，对诋毁、攻击佛教的观点予以驳斥还击。同时，《文心雕龙》的体例深受佛家经典《成实论》的影响。《文心》一书内容，分五大部分，《成实论》内容亦分五大部分，称“五聚”，即发聚、苦谛聚、集谛聚、灭谛聚与道谛聚。这雄辩地证明，《文心》的总体框架与思维模式，受启于《成实论》；而《文心》五部分之各部分内部结构，也与《成实论》“五聚”之每一“聚”基本类似。<sup>[5]</sup>

不可否认的是，《文心雕龙》的“道”，乃至其创作观念上都有道家的踪迹。《原道》篇中提出的“道”是“自然之道”，而追溯“自然”这一概念的萌发，莫不究极道家之本源。自然是道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在《道德经》中，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继承了这一思想内核，并以“庖丁解牛”等故事多次讲述万事万物要顺应自然，保持自然的本真状态，“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刘勰将道家的自然观念内化于心，外显于文，在其书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清静无为的自然感受，营造出天、地、人合而为一的和谐状态。另外，刘勰具体的创作观念上也极富道家色彩。老子曾言：“太上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sup>[6]</sup>庄子认为，要在“心斋”与“坐忘”中，观其心，明万物，屈而物我合一，对世界形成更为一个透彻的认知。《神思》篇中“陶钧文思，贵在虚静”<sup>[12][47]</sup>是对老庄致虚守静、自然无为等思想的认同与继承。刘勰借用了“虚静”这一概念，来描绘理想状态下神思的准备过程：攘除固有的成见，内心保持平和而不躁动，精神也随之纯净，这时积累的学识阅历，和斟酌好的事理逻辑才能以和谐的声律从心中流淌而出。在闲适自然中无碍无滞，故能一泻千里。

文心雕龙之‘唯务折衷’的理论追求，乃是使其成为‘笼罩群言’之作的根本所在；这种所谓‘笼罩群

言’，毫无疑问具有集大成的性质，而其理论实质则是创新，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理论创新。<sup>[7]</sup>

韩愈生活在国势衰退，儒道式微的中唐。但在经济、政治衰退的同时，统治阶级对佛教支持有增无减。韩愈幼时，唐代宗时期“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sup>[8]</sup>佛教鼎盛，兴修寺庙耗散了大量的土地、钱财，这给民生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同时，王公贵族、乃至大批百姓信仰佛教，使佛教愈加兴盛，也使儒家的主导力量愈显疲软。身为传统儒家士大夫，韩愈肩负着一种攘斥佛老，重树儒家正统地位的责任感。而这种情绪在唐宪宗恭迎佛骨的时候发展到了顶点。韩愈对蠹国伤民的“夷狄之教”加以贬斥，作《论佛骨表》以寄托自己强烈的情感激流，表达与佛教势不两立的坚定立场：“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sup>[4]616</sup>文辞直接尖锐、气势夺人，直指一切祸端之源头“佛骨”，表现了作者慷慨激昂的情绪和不畏身死的胆魄，传达了作者为黎民百姓着想的“忧天下”胸怀，和维护儒道之正统地位的士大夫精神。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sup>[4]18</sup>韩愈作《原道》一文，立佛教的出世之学为靶，言其“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从而将佛道置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对立面，而这一观念表面上来源于孔儒，实际上早已内化成中国伦理道德观念的传统，成为每个人修身立德的行为规范。故在此处，佛教被定义为虚空之道，被定义为“进于中国”而扰乱中国的夷狄之法。孔儒则成为了循先王、合仁义的天下公言，并发出“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的口号。

刘勰与韩愈二人在对待佛老的态度上有所差异。韩愈坚持儒道的正统地位，以佛老为异端学说，加以贬斥。而刘勰身上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他对佛老思想的吸收与继承。不过，其著作《文心雕龙》中表现最多的仍是儒家思想，贯穿文本始终。刘勰本人自幼年入寺以来，就一直怀着儒家经世致用发挥事业的理想，当他一旦有了进身机会，认为自己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时，就马上登仕去了。<sup>[9]</sup>

### 三、明道垂文与文以明道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sup>[11]4</sup>，将“道”与“文”结合在一起，启文道关系讨论之滥觞。至于在具体创作中如何做到“因文以明道”，刘勰认为“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sup>[11]2</sup>，

既然圣人之文成为了“道”的外在显现，那么圣人所作的经典将帮助论文者靠近文章创作的“道”之本源。而“情”与“辞”是圣人明道垂文的手段，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创作者应该学习先哲对文辞的运用方式，不重在铺陈奥义奇诡之语词，而是应该用精确的文辞来体察要义，传达正确的观点和精微的理论；深层观之，圣人的“道”是“文”的本根，创作者需要领悟先哲具体想要表达的事理用意和奥秘学问。

在全书首篇《原道》中，文被刘勰置于天、地、人的空间之中，文与天地同生，与人紧密相连，受天地之心的感召，随着“自然之道”而鲜明畅达。标自然以为宗，是刘解原道的用意所在，也是刘勰纠正讹滥文风的旨趣所在；自然之道所具现的自然是人无法参与其成的第一自然，文贵自然所要求的自然是人参与其成的第二自然。（刘勰的自然之道与文贵自然）所以，文可以理解为“自然之道”的外在显现，“自然”应为文学艺术的范式追求。刘勰所生活的宋齐梁三代，追求形式之风极盛，刘勰对此评价道：“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sup>[11]287</sup>。虽然文章需要进行革新，但并不能一味改变文章形式，而忽视文章中内容的重要性。他认为，改变是要遵循自然的，内容真实和情感真挚才是文章之根本，应是“为情造文”，情感积蓄到满溢而出时自然而然成文，顺情而作。若“为文造情”，就会陷入淫丽而烦滥的误区之中，“真宰弗存，翩其反矣”<sup>[11]288</sup>，没有了自身情感的投射，文章无异于空中楼阁摇摇欲坠，所作出来的文也只是一种炫技之作，雕琢浮华却内容空洞而不自知。但若文不至，而志至，他却不那么排斥：“唯七厉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矣。”<sup>[11]26</sup>故可见，文章的形式雕琢并不是为文之重心，文学创作时要厘清本与末才能作出深远而美好的文章。

在“论文序笔”中，刘勰对有韵文“文”和无韵文“笔”都进行了评点。而评点的过程中，刘勰多以儒家经典之道为标准。如在《乐府》篇中，他以周王朝的雅乐为尺，去衡量各朝各代的音乐，所以得出了魏之三祖，音乐浮靡节奏平庸的结论；在《诸子》篇中，他用五经的思想内涵去判断诸子之书，得出了“混洞虚诞”的结论。事实上，刘勰在批评鉴赏文章的过程中，时刻印证并深化着他“明道垂文”的观点。道的履行，不仅需要师法圣人，也需要用圣人之文对自己所作之文加以检验，这样才能使文章达到明道垂文的标准，最终做到“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

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sup>[1130]</sup>的六义境界。

在《争臣论》中，韩愈说道：“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诸人也”<sup>[4112-113]</sup>由此可得出韩愈的文学主张：文以明道。在韩愈的理念中，道须是儒家正统之道，读古文可以明古道，在这一点上，韩愈与刘勰达成了共识。于是，在自己的创作中，韩愈便有意地仿古学贤，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加入文章之中，对儒学之道加以阐发。除了宏观层面地攘斥佛老、追踪儒道的正宗，韩愈还从微观的角度，从细微的小事上进行发挥。以《师说》为例，韩愈通过举例和对比论证，最终证明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sup>[444]</sup>的结论，结构清晰、逻辑严密，可谓“文以明道”的范例。而在《燕喜亭记》中，韩愈将丘、瀑、洞等山水景观都强行赋予了人的属性，以丘为“俟德之丘”，以山谷为“谦受之谷”，譬如此类。履行了“文以载道”这一文学观念，但儒家的道德说教意味甚浓。

至于创作方面，韩愈主张“气盛言宜”、“词必己出”，文应取法于儒家圣贤，“师其意，不师其辞”，但不是对古文的全方位继承，而是应该有自己的思考、见解，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做到“能自树立，不因循”，推崇发自真性情的穷苦愁思之文。“将薪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sup>[4169]</sup>要想要创作出真正优秀的文章，自身能够达到立言的境界，就需要创作主体沉淀以修道，拥有了高超的识见和深厚的学问积累，自然能做到文以明道。韩愈的古文汪洋恣肆，气盛而又言宜，这种气势是韩愈的禀赋之气又经过心志理性转并综合个人的才华、习染、学养，并灌注情感，成为一种勃然不可遏抑生命情意之

气，并注入创作中使得作品表现的独特的风格、结构和形态。<sup>[10]</sup>

#### 四、总结

综上所述，刘勰与韩愈的“道”在内涵上有所差别。刘勰强调的“道”融汇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精华，最终外显为“自然之道”；韩愈之“道”则是攘斥佛老，独尊、独循儒术之后的结果，且韩愈提倡的是先秦儒家中的道之本源，复古以谋新。同时，二者均以儒道为“道”观之基础，用儒家经典去衡量文学作品，用先哲精神去指导文学创作，在“明道”中开创一个新的文学天地。将韩愈、刘勰的“道”观进行对比分析，厘清二人思想的文化根柢，将对道统及韩、刘研究有所裨益。

#### 参考文献：

- [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4：691.
- [3]李振宏.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J].中国史研究.2013（01）：31-68.
- [4]韩愈；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5]王振复.“唯务折衷”：《文心雕龙》文论思想的文化品格[J].求是学刊.2003（02）：85-90.
- [6]黄元吉.道德经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2：67.
- [7]戚良德.文论巨典——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化[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33.
- [8]司马光.资治通鉴4[M].长沙：岳麓书社.2016：5.
- [9]王元化.读文心雕龙[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5.
- [10]夏刚，陶水平.韩愈古文“修辞明道”的路径生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0（04）：113-121.